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近现代印尼属西婆罗洲 华族社经发展与群体认同 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up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West Borneo

曹淑瑶
(TSAO Shu-Yao)

摘要

位于南中国海上的婆罗洲岛，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华人很早即踏足该岛西部地区，做买卖原是他们前来此地的目的，迟至十八世纪中叶，始转而投入当地的采金事业。淘金致富的美梦以及原乡经济的窘迫，迫使华人相继南来，随着移民群体的扩大，也因应外部政经局势的变迁，这个在婆罗洲岛西部聚集、繁育的华族社群之面貌亦随之变化，从早年华族开拓者的异乡成为今日土生华族的故乡。本文拟从历史文本及田野调查采集口述访谈资料，探讨自十八世纪以来西婆罗洲华族社会的政经变迁对其群体认同的影响，以增进吾人对海外华族社会多元化面貌的认识。

关键词：印尼、西婆罗洲、华族、群体认同

* 本文初稿曾宣读于台湾历史学会主办之“漠北与南海——台湾如何接轨世界”主题研讨会（2022年7月），并承蒙与会学者及匿名审查人的宝贵建议，特此致上感谢。

曹淑瑶 台湾东海大学共同学科暨通识教育中心教授。E-mail: shuyao@thu.edu.tw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22

Abstract

Borneo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rade. From very early days, Chinese people went to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island for commerce. By the mid-18th century, the Chinese immigrants began to engage in local gold mining ventures. The desire of getting rich through gold mining and economic hardships in their homeland in Mainland China compelled more and more Chinese immigrants to move ther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is regi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Many Chinese born there started to take West Borneo as their homeland. This article aims to work through historical texts and field researc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there.

Keywords: Indonesia, West Borneo, Chinese Community, Group Identity

一、前言

婆罗洲岛是个地理名词，在政治上，现分属印尼、汶莱、马来西亚三个国家。该岛西部地区为印尼领土，今名“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简称Kal-Bar西加），北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Sarawak）毗邻，西临南中国海与新加坡对望。由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政府（以下简称荷印政府）曾控制当地，在此设置“西婆罗洲府”（Residentie Wester-Afdeeling van Borneo），故尝以“西婆罗洲”或“西婆”之名为人所知。在地理上，中央赤道横跨这片土地，形成高温潮湿又多雨的气候，浓密的热带雨林覆盖全地，河道曲流蜿蜒其间，导致陆路交通难以发展，内陆人烟稀少，¹ 开发落后，由东向西奔流入海、河道绵长且支流交错的卡江（Sungai Kapuas，又称坤江），遂成为贯通此处内陆与沿海地区的重要交通命脉。在十八世纪中叶华人大量移入之前，被华人通称为“喽子”、“劳子”或“撈族”的达雅克人（Dayaks），是这片辽阔雨林里的原始住民，以狩猎、采集和游耕为业，开化较晚，崇尚猎头习俗（郑资约 1974：60-61）；² 至于沿海与河口地区，则是岛外移入的民族如马来人（Malays）、武吉斯人（Bugis）、阿拉伯人（Arabs）的势力范围，他们在这里组成土邦（principality），³ 从事商业和抢掠的活动，并向其治下

民族课征税收和劳役（Cator 1936: 140, 144）。

历史上华人与西婆罗洲地区的接触，应当起源甚早，位于西婆罗洲北部三发河（Sungai Sambas）沿岸的三发（Sambas）一带曾有汉代绿釉龙柄勺的出土（温广益et al. 1985：夹页图，未编页码），足资证明。由于这里盛产着在中国市场上具高经济价值的香料、药材与林木资源，且当地民族在工艺技术上又相对落后，因此，以中国制造的工艺品交易这里的土特产，应是早期华人往来此地的主要目的。1721年展开其探险航行的荷人 Jacob Roggeveen即指出华人已居住三发与沿海的喃吧哇（Mempawah）等地，从事丝绸、花布与其他来自中国、日本商品的售卖（田汝康1987：58）。

早期华人或只在西婆罗洲沿海及距离海岸不远的沿河地区进行买卖。然而，十八世纪中叶西婆罗洲采金事业的兴起，使华人在西婆罗洲的经济活动陡变，大批华人相继南来，涌入内陆矿区淘金，再随着采金地点的转移，溯卡江而上，逐渐深入到婆罗洲岛的中央。座落在卡江下游临海冲积平原上的坤甸（Pontianak），以及分布在卡江暨其支流沿岸的东万律（Mandor）、大院（Tayan）、上侯（Sanggau）、昔加罗（Sekadau）、新钉（Sintang）、彬路（Nansa Pinoh）等埠，与坤甸以北沿海的喃吧哇、山口洋（Singkawang）、邦戛（Pemangkat）、三发等市镇，都有华人拓垦的足迹。但是，华人向西婆罗洲内陆的经济扩张，一方面导致其与散布内陆的达雅克民族间的紧张，另方面也加剧华族社群内部的竞争，或为求保命，或为求巩固自身利益，他们在当地形成独特的自治团体，直至被荷兰殖民势力逐一瓦解。此后，西婆罗洲华族经历荷兰的殖民、日本的占领，以及印尼的独立。这些政治上的巨变，造成西婆罗洲华族的社会经济环境异动，迫使他们几经离散，对于他们的群体认同之形成与凝聚，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学术界对于西婆罗洲华人的研究，向来着重在荷治之前华族在当地的自治势力、印尼独立后的排华与种族屠杀、当代华人的民间信仰以及华语文补习教育的现况等课题上，⁴ 许多研究皆不约而同地指出战后初期西婆罗洲华族倾向原乡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使他们在印尼排华期间承受严重的种族性迫害。本文则拟运用文献资料，辅以田野调查所

采集的口述历史访谈内容，对于西婆罗洲华族社会所遭遇的不同政治经济变局对其群体认同的影响，进行一个历史性的探索，以增进吾人对海外华族社会多元化面貌的认识。

二、近代西婆罗洲华族社会的形成

华人踏足婆罗洲的历史甚早，由于商业买卖与季风航行的缘故而有“住蕃”的情形，他们常与当地住民杂居共处，但因群体规模较小，流动性也大，或有因通婚混血而留下的后嗣，却也往往融入在地社会，并不以华人的身分自居。⁵ 今日西婆罗洲华族社群的形成，则源自十八世纪中叶因金矿开采而涌入的大批华工。

西婆罗洲地层蕴藏金矿与钻石。十三世纪时，兴起于爪哇岛东部的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势力曾延伸至西婆罗洲内陆，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控制这里的矿藏（Cator 1936: 139）。约在1750年左右，大批疑似来自汶莱或邦加（Bangka）的华工（Jackson 1970: 20），在喃吧哇的武吉斯“喃吧汉”（Panembahan）招募下（Yuan 2000: 25），⁶ 聚集坤甸北边的百富院（Sungai Duri）一带淘金（Heidhues 2003: 51），随即三发等地的马来统治者们也招募华工前去采金（Yuan 2000: 25），采矿的地点遂遍及卡江流域的万律河（Sungai Mandor）上游、喃吧哇河（Sungai Mempawah）南岸支流，再向北扩大至打唠鹿（Montrado），并深入三发的内陆地区。

此时西婆罗洲盛产的金矿以砂金为主，主要分布在距离地表2呎到12呎或8呎到15呎深处的松软黄土里，华工采用引水淘洗表层砂金的技术，将这些含有砂金的松软黄土放入小水道内，引河水冲洗，密度较轻的泥沙和其他杂质会被流水冲刷掉，留下密度较重的砂金（Doty and Pohlman 1839: 287, 289; Earl 1837: 285-286）。最初，华人是以小团体的形式，在山坡地区进行金砂的淘洗。这些小型采矿组织被称为“山沙”（shansha）或“把坵”（parit），人数介于10至25人之间（周丹尼Daniel Chew著，黄顺柳译1990: 26），通常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结合，采互助投资的方式集资（Yuan 2000: 37-38），他们依附在马来苏丹或喃吧汉的控制下，并

受到这些统治者的严重剥削（田汝康1987：62）。随着采矿规模的扩大，采矿组织也逐渐发展为成员较多，且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高度自治的“会”或“公司”；复因采矿团体之间的利益竞夺，为巩固势力与谋求生存，这些华人公司开始透过联合或兼并的方式，形成更大的组织，例如：1776年时成立的“和顺总厅”，即是分布在打唠鹿与三发的14家公司的联盟，总部设在大港公司所在的打唠鹿市镇，势力范围涵盖百富院、孟加影（Bengkayang）至三发一带（田汝康1987：64）。

由于采金能创造丰厚获利，⁷ 对受迫于原乡中国艰困生活的华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十八世纪的60年代与70年代，每年农历的2、3月间，约有1,500至2,000人自粤东的潮州、惠州、嘉应州（梅州）及闽南地区前来婆罗洲西部；至十八世纪末，据估西婆罗洲华族人口已超过40,000人（Yuan 2000: 25-27, 32）。根据1834年从新加坡前往西婆罗洲地区与和顺总厅商谈鸦片贸易的英籍商人George Windsor Earl之记载，在1823年荷兰控制婆罗洲西岸沿海地区以前，每年约有3,000名华人移入这个地区，粗略估算华族人数约有15万，其中9万人住在内陆华人区里，其他人则散居在荷印政府控制的区域（Earl 1837: 250）。内陆华人区的聚落如打唠鹿、东万律、喇喇（Lara）、炉末（Lumar）等处，皆因矿业而成为华人聚集之地。

基于血缘与地缘的连结，早年在西婆罗洲采矿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惠州府的海丰、陆丰，潮州府的大埔、河婆（揭西）、惠来及嘉应州（田汝康1987：63-64；Yuan 2000: 15），以客家话为通用语言。⁸ 随着采矿规模的扩大以及淘金所带来的利益与竞争，似使这些华人公司必须接纳具备不同功能的成员加入，以配合采矿之外其他事业的发展，⁹ 西婆罗洲华族移民的来源因而多元化，间或混杂着操闽南方言而被称为“福佬”的潮州人（Cator 1936: 27-29），及操闽南语的福建人、自称“本地人”的广府人等，例如：1818年至1819年间短暂担任和顺总厅“大哥”的胡亚禄即是福建人，他原是在三条沟公司负责炼铸刀剑的铁匠（Yuan 2000: 15, 77, 97）。

大抵上，在早期海外华族社会里，方言群体与其职业、居处向来存在

着紧密的关联性，此现象在西婆罗洲亦然。在内陆矿区里，人数极具优势的客家人，大多是采金矿工，平日在矿坑劳动，少部分人则是担任农人、渔夫和小商人，居住在公司境内规模较小的聚落巴刹里；至于坤甸、三发、打唠鹿等较具规模的市镇里，其华族居民则以粤东的潮州人为主，间杂少数福建人和广府人，他们多是商人、工匠和工人，掌控市镇的商业与制造业（Heidhues 2003: 72-73）。

三、荷治时期西婆罗洲华族社会的转型

在华族采金事业兴盛之际，荷兰殖民势力也扩张至此。荷印政府接管荷属东印度后，自1823年起，要求西婆罗洲华人缴交每年2盾的人头税，入境时每人得缴交2盾，离境时再缴交1两黄金，1825年起再规定输入华人的所有物品须课征12%的税。兰芳公司总厅首先臣服于荷印政府，其第六任总厅大哥刘台二于1824年接受荷印政府授与的“甲太”（Kaphthai）头衔；¹⁰ 以大港公司为首的和顺总厅，一方面与荷印政府武力对抗，另一方面又与三条沟公司、兰芳公司陷入争斗，1851年1月被迫接受荷印政府敕封（Yuan 2000: 112-146, 160-184, 246），1854年7月再被荷印政府联合兰芳公司派军击溃。幸存的兰芳公司于1856年和荷印政府订约划分势力范围（高延J. J. M. De Groot著，袁冰凌译1996: 26），至1884年甲太刘阿生过世后，亦被荷印政府解散（Yuan 2000: 188-259）。长期的动荡纷扰更造成大批华工及眷属渡越到砂拉越寻求发展。¹¹

在华人公司解散后，西婆罗洲华族从矿业淡出，转向农业与商业发展。根据荷印政府对辖下西婆罗洲府外籍东方人职业的统计，¹² 1875年时登记为矿工者1,574名，登记为商人者1,942名，登记为工匠者650名，登记为农民者3,506人；1891年时，矿工人数减至1,085名，农民则增至4,604人，商人有1,838名；1895年时，矿工人数再减为1,043人，农民则增至4,799人，商人增至2,226名（Heidhues 2003: 99-100, 134, 149-150）。至1930年，西婆罗洲华族中有职业者，51.4%从事初级原料生产及园艺，48.6%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Cator 1936: 161）。

在人口数量上，虽然荷印政府对华人公司的武力征伐以及限制华人入境的措施，一度导致西婆罗洲华族人口衰退至1856年的24,000人，但由于甘蜜、胡椒、椰树与胶树等经济作物的栽植及原料的初级加工所产生的劳力需求，西婆罗洲华族人口从1880年的28,000人，增至1895年的37,000人，1900年有41,500人，1905年有48,000人，1920年有67,000人，至1930年已达108,000人。在1905年至1930年间，西婆罗洲华族人口增长了120%，平均每年有超过2,000人入境，同时，也有大批华人返回原乡中国，流动性极大（Cator 1936: 159-160）。在方言群方面，客家人和潮州人是西婆罗洲华族中主要的方言群体。依据荷印政府1930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居住在“可以进行全面人口调查的地区”的66,700名西婆罗洲华族中，客家人有38,323名，潮州人21,699名，广府人2,961名，福建人2,570名，其他华人1,257名（Cator 1936: 160）。

在空间分布上，西婆罗洲华族迁离采金事业兴盛时期的内陆聚落，纷纷涌向沿海地区从事农业或商业活动，少部分人则因收购森林产品、淘金或农业拓垦，沿着卡江溯流而上，在各河段建立聚落，最远能到上游的富都（Putus Sibau）。1930年时，多达73.4%的西婆罗洲华人居住在山口洋县（Afdeeling Singkawang）辖下的山口洋区（Onderafdeeling Singkawang）与喃吧哇区（Onderafdeeling Mempawah）以及西婆首府坤甸（丘守愚1934: 38、40）。这种人口的流动与市镇的兴衰，尚可从各聚落的华人侨长派任窥知，例如：1930年代末期，沿海的松柏港（Sungai Pinyuh）设有甲必丹、老大等数名侨长，反观曾盛极一时的矿都东万律，华人仅余二、三千人，店铺五、六十间，仅委派一名老大负责华人事务和代送邮务（刘焕然编1939: 第四编46）。但是，二战以前的西婆罗洲华族仍然算不上是市镇居民，因为他们从事农耕与园艺的人口较多，故而居住市区的人口比例仅占22.2%，高达78.8%的华人居住在市郊乡村地带，以山口洋县为例，在其辖下的山口洋区华人有37,872人，定居于市镇者却仅4,200人（Cator 1936: 160-161）。

大抵上，在西婆罗洲市郊乡村地区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华人，以客家人为大宗；至于市镇则因具备较多的功能，必须提供多元的服务，就业机

会较多，故而易吸引不同族群的移入，使其居民的构成更具多样性。以西婆罗洲第一大港，同时也是西婆罗洲首府的坤甸为例，早在十九世纪初叶时，马来人、武吉斯人、阿拉伯人、华人、荷兰人等族群，已在此地形成各自的聚居区，当中华人的聚居区有两处，最早发展的是位于卡江南岸的老埠头，与荷兰人的聚居区毗邻，潮州人与福建人主要聚集此处，经营土产、米、糖、油、布帛与百货的买卖；新埠头则位于卡江北岸，发展较晚，原是兰芳公司在此兴建锯木厂和造船厂，沿河有不少工厂、货仓，是坤甸的工业区、货仓区，是客家人聚集的区域（Doty and Pohlman 1839: 30；刘焕然编1939：第四编38-40）。1939年出版的《荷属东印度概览》一书曾载录11位坤甸名侨人物，当中5人祖籍广东嘉应州，4人祖籍广东潮州，1人祖籍福建漳州，1人祖籍广东惠州；除1人服务于教育界，1人出身政界，其余9人皆为商人，主要经营米、糖、油、杂货等买卖，兼营树胶、椰干的种植与初级加工、锯木等制造业，以及航运业（刘焕然编1939：〈前代典型人物志〉5、〈现代名侨人物志〉11、48、49、50，未编页码），适可印证市镇华人多方言群体及从事工商活动的现象。除此之外，西婆罗洲第二大港，亦曾是以大港公司为首的和顺总厅发展来突破马来苏丹或荷印政府挟制的重要港埠，以及生产矿区劳工所需粮食的山口洋，当地华人大多数经营商业，从事零售商及出口商，在胡椒、树胶与椰子的种植上，亦占据重要地位（陈达2021：62）。山口洋市区座落着一间大伯公庙（Vihara Tri Dharma Bumi Raya Pusat Kota Singkawang），该庙正殿主神龛祭客家人称为“伯公”的福德正神，左神龛祭闽南地区盛行的广泽尊王，右神龛殿祭潮州盛行的安济圣王。这三种信仰并立一处，显现早期山口洋市镇华族居民的构成包含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等方言群体；同时，也体现出该地农业与商业经济兼具的特色（曹淑瑶2020：81）。

虽然，初期前来婆罗洲西部淘采砂金的华人，或许只是抱持着暂居心态，期盼一朝荣归故里；可随着一些人与达雅克妇女通婚（Earl 1837: 259；陈达2021：62），或者携家眷南来，家庭的建立有助于血脉的繁衍，华族社会也就因此得以延续发展，落地生根。至1930年，多达75%的西婆罗洲华人出生当地，比例与爪哇华族社会相仿。¹³ 不少西婆罗洲华人自先辈

南移虽已迄五、六世之久，却不似其他荷印地区土生华人具明显的“印尼化”倾向（廖建裕1993：53、59、76），反而“自视为异乡人，即便他们已经土生数代，拥有土地，且从未到过中国”（Heidhues 2003: 196）。载录于1939年出版的《荷属东印度概览》书中的11位坤甸名侨人物，多达8人是土生华人，当中曾任吧城中华女学校总理的张怀金，祖籍广东惠州，出生在位于卡江上游的新钉，是第5代土生华人；曾任坤甸中华总商会主席的林儒荣，为祖籍广东蕉岭的客籍土生华人，已侨居坤甸6世；曾任坤甸中华总商会主席的郭两捷，祖籍广东潮安，自祖辈南来已历百余年，此3人皆能通晓中文，张怀金还曾数度前往中国观光并“端访故里，访问乡情”；林儒荣则因捐献广东蕉岭县立中学、梅县中学、汕头始正学校，曾得民国北洋政府农商部颁授三等奖章，“以励其善行”。此时原乡中国内忧外患纷沓，天灾人祸迭起，不仅身为新客的坤甸名侨积极投入筹赈祖国的事业，8位土生的坤甸名侨当中亦有5人积极参与各项筹赈活动，出资出力，尤其林儒荣曾在坤甸华社筹赈广东潮汕风灾时担任财政，在国父孙中山逝世追悼活动担任财政，在筹款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会时担任财政，在坤甸华侨救国后援会中担任执行委员兼财政科主任，在坤甸庆祝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大会担任筹备委员兼交际科财政主任，他亦是星洲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客帮劝募员；郭两捷曾任坤甸赈济祖国难民慈善委员会主席、坤甸华侨救国后援会主席；身为第四代土生华人的赖炳文，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坤甸组织图存书报涉及图存学校，宣传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党驻西婆罗洲直属支部整理委员，坤甸筹赈会常务委员，亦曾被推选为代表出席星洲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刘焕然编1939：〈前代典型人物志〉5、〈现代名侨人物志〉11、48、49、50，未编页码）。1935年初曾游历荷属东印度的爪哇、邦加与西婆罗洲的中国社会学者陈达，对当时打唠鹿甲必丹赖星曹深具旧学造诣，能诗能文，又建筑一临湖中国式别墅，自号“小西湖”等事，多所著墨；他亦留意到当时西婆罗洲土生华人支持原乡中国的革命事业或响应原乡中国的政治社会运动、荷印政府禁止多达570种宣传原乡中国政经形势或意识形态的中文书籍入口，以及一些土生华人尚与原乡亲族书信联系等情况（陈达2021：59-60、64、66-68、71）。

西婆罗洲华族这种“异乡人”的心态，尚可从其惯常的语言窥知，因为对于民族而言，语言向来被视作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以作为分辨我群与他者之间的重要标准。根据1920年荷印政府的人口普查，高达99%的西婆罗洲华族以中国方言为其主要语言（Coppel 1983: 158）。从西婆罗洲华族方言群体的构成，所谓的中国方言，不外乎客家话与潮州话。由于客家人是西婆罗洲华族里的优势群体，其经济活动涵盖农、商、矿等等产业，居住地遍布沿海、内陆的市镇以及郊区乡间，使得客语成为分布最广的华族方言，自坤甸新埠头一路北行经百富院、喃吧哇、孟加影、山口洋、邦戛至三发一带，以及从坤甸溯卡江而上深入婆罗洲内陆的沿河聚落如大院、上侯、昔加罗、双沟月（Sungai Ayak）、新钉、彬路、文律（Boedoet, Nansa Bunut）、富都等聚落，都是客语分布区域；若再细分腔调，西婆罗洲通行的客语尚可以百富院为界，自百富院以北至三发一带盛行海陆丰与河婆客话；百富院以南至坤甸新埠头再上溯卡江沿岸则盛行四县客语。同时，客语也成为西婆罗洲不同方言群体的华族，甚至与华族通婚或往来的达雅克人之间的交际语言，（陈达2021：61-62、64、68；周沅瑶，与作者谈话，印尼雅加达，2011年7月31日；范铤钗，与作者谈话，台湾新竹，2014年7月4日）。

四、二战后西婆罗洲华族社会的发展

1942年1月27日，日军从邦戛登陆，随即占领山口洋，并在2月2日攻下坤甸，荷印军队在3月8日投降。由于此前荷印军队的焦土政策与日军的军事活动，大举破坏西婆罗洲的港口、道路、桥梁等各项交通设施与民间企业的工厂、货仓，导致西婆罗洲百废待举，物资严重缺乏。日军统治期间，华族在商业活动上遭受排挤（Heidhues 2003: 199-200），许多华族社会菁英经过颠沛流离，仍遭日军搜捕屠杀（文化出版社编辑部1947：9-12；林汉文2009：38-88）；战后重返的荷印政府为对抗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共和国之势力，对荷属东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采取严格的垄断措施，极力扶助荷商与印尼民族商人，在在使战后西婆罗洲华族社会经济恶化。1949年12

月27日自荷兰取得独立的印尼政府（《南洋商报》1949a），对境内华族在经济领域上的优势，以及华族与原乡中国之间的联系，更是充满敌意。

自1950年代开始，印尼政府极力推动排华，陆续颁布法令限制华人移居印尼，规定离境前往中国的华人不许重返印尼，向华人征收高额的外侨税（黄昆章2005：2-7），自1952年5月起，又陆续发布法令限制华侨办学，监督华校的教学内容、教科书的采用，不准华校招收印尼籍学生，并限制华校开办的地点；1957年开始关闭部分地区的华文学校；1958年4月下令封闭华文报刊；1958年10月关闭与印尼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侨民设立的组织，1959年5月起禁止使用华文招牌（丘正欧1995：22-29、36-40；黄昆章2005：71-72、95-96）。印尼在经济上的排华，¹⁴ 对于华族社会冲击更大，尤其1959年颁布的〈总统第10号法令〉（Peraturan Presiden 10,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10），宣布自1960年1月1日起禁止县城以下乡村地区的外侨经营小商店或担任零售商（《南洋商报》1959b；《南洋商报》1959d），该法令一经颁布，印尼军方就开始执行驱离华人的行动（《南洋商报》1959a；《南洋商报》1959c）。由于西婆罗洲华族多以农工、零售商、中间商为业，在这一波波产业印尼化的过程中，他们首当其冲，生计受到影响，许多人负担不起高昂的外侨税，更难以取得印尼的公民权。根据印尼安达拉通讯社（Antara News Agency）于1960年4月7日的报导，因〈总统第10号法令〉的实施，在印尼属西婆罗洲办理登记而听候遣返中国之华侨就有10,200人（《星洲日报》1960）。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军事政变；¹⁵ 翌年3月12日，苏哈托受印尼人民协商大会特别委员会的委托，代行总统职（《南洋商报》1966a），开始进行肃共行动（《南洋商报》1966b），特从爪哇派遣军队前往西婆罗洲扫荡活跃于婆罗洲印马边界上的砂共（Pasukan Guerrilla Rakyat Sarawak）（《南洋商报》1967c）。1967年7月间，印尼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报纸屡屡将西婆罗洲华人“妖魔化”（demonizing）为共产分子，宣传西婆罗洲是共产中国的飞地（enclave）（Tanasaldy 2012：143）；印尼军方更曾拜访西婆罗洲各地的达雅克人领袖时，指责华人“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党徒”（Peluso 2008：52），并藉由砂共于1967年9月3日攻击孟

加影区北部华莪（Sanggau Ledo）附近一处名为Taum的达雅克人聚落的传闻，¹⁶ 挑动深居卡江上游内陆的达雅克人，自1967年10月中旬至1968年1月间，对居住在西起喃吧哇、松柏港与孟加影的郊区，北至华莪，南至阿羊岸（Anjungan）、东万律、邦加宁（Menjalin）及打猎镇（Senakin）这片区域的华族，展开屠杀式的报复行动。这场被称为“红头事件”的种族屠杀惨案，粗估造成多达50,000至117,000名原本居住在乡间的华人沦为难民（Coppel 1983: 145; Peluso 2006: 113），陆续自内陆乡村逃奔到山口洋、坤甸与松柏港等沿海市镇。¹⁷

自1965年军事政变之后，印尼政府基于反共的理由，一度禁止共产国家轮船川航印尼（《南洋商报》1965）。1966年4月中旬，印尼外交部长马力克（Adam Malik Batubara）宣称印尼华族“尽可回国”，但拒绝为他们安排船运（《南洋商报》1966c）。同年5月中旬，北京当局宣布将派船接华侨返回中国（《星洲日报》1966a）；9月6日再宣布已照会印尼驻北京大使馆有关撤侨行动的安排，第一批接侨的中国轮船定于9月20日抵达苏门答腊的棉兰（Medan），之后将再加派其他船只分别前往爪哇的雅加达、泗水（Surabaya）等港口继续接侨工作（《星洲日报》1966b）。但中、印双方因排华议题，外交冲突不断，关系愈形恶化，¹⁸ 1967年9月15日印尼训令驻华使馆全体职员离开中国（《南洋商报》1967d），10月9日再宣布中止与中国的邦交（《南洋商报》1967e；《南洋商报》1967g），10月28日北京当局宣布关闭驻印使馆，撤回外交官（《南洋商报》1967f；《星洲日报》1967c），原已困难重重的撤侨行动（《南洋商报》1966d；《星洲日报》1967a；《南洋商报》1967b），最终停止。因此，当西婆罗洲种族屠杀惨案爆发后，大批华族难民已无返回或前往中国的可能。

自印尼独立以来各种排华政策的实施，冲击着西婆罗洲华族社会的发展。首先，在人口结构上，华族在西婆罗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滑，从1953年的25%降至1971年的12%，至2000年时更降至9.45%（Tanasaldy 2012: 50, 304）。1967年种族屠杀事件又促成西婆罗洲华族剧烈的人口流动，大批原居于内陆乡间的华族又一次蜂拥至沿海的城镇。当

时坤甸县长曾指示各区官员将华族难民遣回（Tanasaldy 2012: 145），可是位于坤甸与三发县内陆的13个村村长却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华族难民重返他们已被驱逐出的家园（《南洋商报》1967j）。事实上，在华族仓皇地逃离原居处后，他们留下来的财物、食粮、屋舍、店铺、田地，已经被达雅克人、马都拉人等民族掠夺或占据，难民们根本无法再回到原本居住的村落生活。于是印尼政府只好拟定沿海一些特定区域以及卡江流域，作为重新安置难民的地点（《南洋商报》1968a；《南洋商报》1968c）。1968年2月，收容华人的难民营奉令关闭（Heidhues 2003: 253），绝大部分的人就在这些沿海市镇周围的荒地上或在已撤除的难民营地上，搭建简陋的屋子定住下来（范铤钗，与作者的谈话，台湾新竹，2014年7月4日；钟翠娜，与作者的谈话，马来西亚雪兰莪加影，2014年8月22日）。这一年，在山口洋区登记户口的难民就多达22,662人，另有25,669名难民在坤甸登记户口，11,519名难民在喃吧哇与其周边地区登记户口（Hui 2011: 137）。

这波华族人口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强化了西婆罗洲华族群居群聚的现象，从而让华族社会变得高度都市化，然而人口的高度集中却不能确保相对的经济成长，反而恶化了沿海市镇经济。在种族屠杀事件平息后，西婆罗洲地区陷入严重的饥荒，印尼政府没有妥善给予华族难民照护与安置，造成许多孩童、老人、孕妇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一些人因无法承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或企图自杀（《南洋商报》1967h），平均每天有15名难民丧命，仅1968年上半年死亡人数就超过2千人（《南洋商报》1968c）。在难民聚集甚多的山口洋市区，当地没有制造业，市场规模小，就业机会少，难民找不到工作可做，只能跟在地的亲人分田种米种菜（黄圆惠2012: 51），不然就上山砍柴或采摘包裹东西用的树叶来卖钱，或者编笠帽、草席换生活用品（过路客2017），艰辛度日；有些人因为贫病交迫，没办法以劳力挣钱，在难民营附近乞讨，甚至有称斤论两贩卖儿女的情况（《南洋商报》1967i），一些年轻女孩子为了生计只好靠皮肉讨生活（《南洋商报》1968b），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让客家话原意为“小女儿”或“小姐”的“阿妹”（amoy）一语成为妓女的同义词（Heidhues 2003: 254）。

经济难以复苏，进一步促成了西婆罗洲华族自1970年代以来不断地向外迁移，山口洋尤为这波“再移民”最主要的移出地。一部分难民离开经济恶化的山口洋，再迁移至坤甸南方的道房（Ketapang）及卡江中游的上侯、新钉、彬路等地，或离开西婆罗洲到马辰（Banjarmasin）、万隆（Bandung）、茂物（Bogor）、帝博（Depok）、泗水等外省谋生；更有不少华人选择到印尼首都雅加达讨生活，当中有点资本或技术的人就开设成衣厂、服装店、裁缝店、面店、饭店或卖糕饼小吃，不然就是替人打工、当店员等，他们一赚到钱就寄回西婆罗洲老家，维持原生家庭生计，不少人凭借一番努力，在事业上获得不小成就，将家乡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带出来（杨建昌、周沅瑶，与作者的谈话，印尼雅加达，2011年7月31日；钟学胜，与作者的谈话，印尼西加山口洋，2011年8月3日；范铨钗，与作者的谈话，台湾新竹，2014年7月4日），经由这种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而建立的迁移网络，在雅加达西区（Jakarta Barat）的五角桥（Jembatan Lima）、铁桥（Jembatan Besi）、万灵岸（Bandengan），雅加达北区（Jakarta Utara）的安贝拉（Ampera）、巴德芒安（Pademangan）等处，逐渐形成山口洋华人聚居的离散社群；还有一些人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日本打工（叶锦进，与作者的谈话，印尼西加山口洋，2011年8月4日；范铨钗，与作者的谈话，台湾新竹，2014年7月4日）。

旅“外”的经验，似乎使西婆罗洲华族重新省思他们的群体与地缘认同，当他们在西婆罗洲境外形成的离散社群里组织以西婆罗洲华人为成员的社团或活动时，常会冠上现居地和西婆罗洲原居地的地名，例如：“旅椰山口洋地区乡亲会”（Perkumpulan Masyarakat Singkawang dan Sekitarnya, PERMASIS）、“山口洋福律旅椰乡亲会”（Perkumpulan Masyarakat Kulor dan Sekitarnya, PERMAKUS）、“山口洋南华中学旅椰校友会”、“旅椰西加山口洋南区盐町乡亲会”（Perkumpulan Warga Jamthang, PERWAJAS）、“旅椰西加邦戛地区乡亲会”（Perkumpulan Warga Pemangkat dan Sekitarnya Kal-Bar, PERWAKAT）、“西加大湾肚旅椰乡亲会”（Perkumpulan Masyarakat Teluk Suak dan Sekitarnya, PERMATES）、“西婆罗洲双沟月旅椰同乡联谊会”（Perkumpulan Warga

Sungai Ayak se-Jabodetabek, PWSAJ)、“西婆罗洲大院旅椰同乡会”(Perkumpulan Warga Tayan, PERWARTA)、“西加松柏港旅椰同乡会”(Perkumpulan Warga Sungai Pinyuh Kal-Bar, PWSP)、“西加坤甸新埠头旅椰乡亲会”(Paguyuban Perantau Siantan Pontianak, PPSP)、¹⁹“旅港印尼西婆罗洲山口洋地区乡亲校友同乡会”。²⁰“旅椰”或“旅港”的用语,一方面说明他们自认自己漂泊“异地”、“他乡”,对现居地抱持着一种“暂居”与“流寓”的意识,另方面也展现出他们对于自己出生、成长,而后离开的西婆罗洲这片土地,存有着“故乡”的体悟。

五、结语

由于西婆罗洲中央赤道横贯,气候高温潮湿多雨,热带雨林浓密,人烟罕至,导致当地发展缓慢,在西方民族开始接触婆罗洲岛时,这片雨林的原始定居者还过着以游耕、采集、捕猎的生活。近代华族移民的迁入,无疑对于西婆罗洲的开发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印尼独立前,西婆罗洲华族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群体,他们或在华人公司兴盛时期前来淘采砂金,或在荷兰殖民时期前来投入农业及工商活动,促其南来的背景因素,不免与改善中国原乡艰难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或许就是这样频繁地在原乡中国与西婆罗洲之间的往来流动,原乡中国社会与西婆罗洲华族社会得以紧密连结,即便是属于父祖辈们迁移的历史记忆,对于那些已经在西婆罗洲土生数代、拥有土地也从未到过原乡中国的华人,仍能产生影响,使他们的政治与文化意识、群体的认同感仍是属于原乡中国。但是,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而原乡中国政权鼓励海外侨民归化的态度,或许松动了原乡中国社会与西婆罗洲华族社会之间的连结;独立后的印尼在西婆罗洲激起的排华运动,尤其1967年末的种族屠杀事件,强化西婆罗华人群居群聚的现象,也加剧华族社会经济上的困境,不少居住于西婆罗洲的华族为求生存与发展,只能转向印尼首都雅加达或印尼境外非原乡中国的地区“再移民”。有别于其先辈历史上的流动,这一次,他们对于原乡的记忆不再是中国的,而是他们土生的西婆罗洲,这个位于赤道上他们先辈曾

经的异乡，终于成为他们心中真正的故园。

注释

- 1 根据1930年人口普查，荷属婆罗洲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仅4人；1961年人口普查，印尼属加里曼丹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7.6人，参见丘守愚1947：14-15；郑资约1974：27。
- 2 直至二十世纪末，达雅克人仍常以猎头的方式攻击华人或马都拉人（Madurese）等岛外移入的民族，见Tanasaldy 2012：198。
- 3 荷兰人称这些土邦为vorstenlanden、principalities，其统治者为vorsten、sultan、panambahan，在十八世纪中叶淘金热兴起时，西婆沿海地区的土邦数量已多达二十几个，见Yuan 2000：20。
- 4 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诸如：罗香林的《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1961）；James C. Jackson的*Chinese in the West Borneo Goldfields: A Study in Cultural Geography* (1970)；Wang Tai Peng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Borneo* (1977)；Charles A. Coppel的*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1983)；田汝康的〈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末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公司组织〉（1987）；袁冰凌（Bingling Yuan）的*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2000)；Mary Somers Heidhues的*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2003)；曾恕梅的《十八，十九世纪东南亚“华人公司”型态之研究：以西婆罗洲与新马地区为例》（2003）；Nancy Lee Peluso的“Passing the Red Bowl: Creating Community Identity through Violence in West Kalimantan, 1967-1997” (2006) 及“A Political Ecology of Violence and Territory in West Kalimantan” (2008)；蔡丽的〈印尼西加里曼丹发展华文教育的经验〉（2009）；许耀峰（HUI Yew-Foong）的*Strangers at Home: History and Subjectivity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2011)；Margaret Chan的“The Spirit-mediums of Singkawang: Performing ‘Peoplehood’ of West Kalimantan” (2013)；曹淑瑶的《历史的长河：印尼山口洋的华人》（2020）等等。
- 5 例如：位于婆罗洲岛东北部的马来西亚沙巴州（Sabah, Malaysia），有一个名为“杜森”（Dusun，或译杜顺，1961年8月改称Kadazan嘉达山）的民族，容貌与华人极为相似，相传是华人的后代，但其语言文化与族群认同，自成一系，实与华人有别，他们既不认为自己是华人，也不被华人视同一分子。有关杜森人的起源传说，参见三厄斯1950；斌人1951。
- 6 Panembahan是历史上爪哇与婆罗洲等地的统治者所使用的一种头衔，“喃吧汉”之译称出自〈兰芳公司历代年册〉，收入高延（J. J. M. De Groot）著，袁冰凌译

- 1996: 17。有关喃吧哇的武吉斯喃吧汉政权之建立, 参见Heidhues 2003: 29。
- 7 根据1812年的估算, 西婆罗洲每年黄金产值高达474万西班牙银元, 见Low 1848: 24。
 - 8 袁冰凌认为在西婆华族中原籍惠州海丰、陆丰者人数众多, 他们被称为“半山客”(pansanhak), 是能操双语的客家人与福佬人, 就文化而言与福佬和福建族群极为接近, 见Yuan 2000: 15, 30。但袁的看法与1838年时从新加坡搭乘帆船抵达西婆传福音的两位美国传教士E. Doty和W. J. Pohlman的经验极具差异, 相关讨论见曹淑瑶2020: 65。
 - 9 华人采矿公司会在沿海地区制盐、捕鱼、制鱼干; 在内陆矿区周围种稻、蔬菜和养猪; 在辖下区域里设立印尼语称为“巴刹”(pasar)的市集, 开鸦片馆、赌场、屠宰场、酿酒厂, 以及办制华人所需各式器具的作坊, 见Yuan 2000: 40-41, 155。
 - 10 有关荷印治下“甲太”一职的讨论, 可见曹淑瑶2020: 35-36。
 - 11 和顺总厅在三发发动的战事, 导致该地区的华人逃难砂拉越, 见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51; 田汝康1987: 84-88; 周丹尼(Daniel Chew)著, 黄顺柳译1990: 29-30。
 - 12 华族向来是荷属东印度外籍东方人口中最大的群体, 根据1905年人口调查, 西婆罗洲外籍东方人有48,881名, 当中华人有48,348名, 占外籍东方人口的98.9%, 转引自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14。
 - 13 爪哇华人土生的比例则为79%, 见Cator 1936: 40, 160。
 - 14 相关措施可参见郭梁1998: 164-165。
 - 15 这个被称为“9·30运动”的政变, 因官方宣称是由中国与一些印尼华族所支持的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策动的, 导致反共行动演变为激烈的反华浪潮。相关讨论可参阅郑学稼1976: 249-330。
 - 16 Taufiq Tanasaldy认为这个传闻被攻击的村落应该是坐落在孟加影区南部邻近万那(Landak)的Tamu村, 见Tanasaldy 2012: 147。
 - 17 有关红头事件中西婆华族的经历, 可参阅林世芳编2010。
 - 18 1967年4月23日, 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遭到印尼武装部队扣押, 北京当局立即发出强烈抗议的牒文, 谴责印尼, 要求立即释放徐仁, 翌日印尼政府即宣布中国代办暨总领事须于当周内离开印尼, 北京当局也立即回以相同的报复行动, 相关报导见《星洲日报》1967b; 《南洋商报》1967a。
 - 19 在明清文献里, 华族将吧达维亚(今雅加达)称为噶喇吧, 系源自印尼文的椰子(kelapa)之译音, 故华族常以“椰城”来简称吧达维亚/雅加达, 或将Jakarta音译为“椰加达”。有关噶喇吧地名的考证, 可参阅韩槐准1952: 45; 印尼脱离荷兰统治后吧达维亚复名为雅加达, 见《南洋商报》1949b。
 - 20 “港”即香港。至1976年, 超过30万印尼归侨离开中国大陆, 其中25万人前往香港, 2.5万人到澳门, 见Godley 1989: 349。

参考文献

- 斌人1951。〈北婆的杜森族〉。《星洲日报》1951年11月18日游艺场08版。
- 蔡丽2009。〈印尼西加里曼丹发展华文教育的经验〉。《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9(2): 8-17。
- 曹淑瑶2020。《历史的长河：印尼山口洋的华人》。新北：稻乡出版社。
- 曾恕梅2003。《十八，十九世纪东南亚“华人公司”型态之研究：以西婆罗洲与新马地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 陈达2021。《浪迹十年之闽粤、南洋记闻》。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 高延(J. J. M. De Groot)著，袁冰凌译1996。《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郭梁1998。《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过路客2017。〈缅怀西加“红头事件”五十年〉。《国际日报》2017年11月27日印华论坛/副刊A5版。
- 韩槐准1952。〈椰加达纪行〉。《南洋学报》8(2): 45-53。
- 黄昆章2005。《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圆惠2012。《移动在两个家庭之间：北台湾印尼客家女性的认同与情感民族志》。硕士学位论文，新竹国立交通大学。
- 廖建裕1993。《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林汉文2009。《我所经历的坤甸大屠杀》。纽约：柯捷出版社。
- 林世芳编2010。《西加风云》。砂拉越民都鲁：余清禄。
- 刘焕然编1939。《荷属东印度概览》。新加坡：强华图书出版社。
- 罗香林1961。《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香港：中国学社。
- 《南洋商报》1949a。〈女王昨签署海牙协定 荷对印尼主权结束〉。1949年12月28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49b。〈三四七年印尼荷兰统治权正式结束 首都吧城恢复旧名称〉。1949年12月28日电讯二02版。
- 《南洋商报》1959a。〈苏北亚齐廖省乡村华侨小商今年必须停止营业 仅准在三十一市镇营业 华侨小商泪诉痛苦求当局通融〉。1959年7月20日马来亚四12版。
- 《南洋商报》1959b。〈印尼内阁议决禁止外侨小商〉。1959年11月6日电讯三03版。
- 《南洋商报》1959c。〈执行乡区零售商禁令 印尼军方在西爪逮捕华侨百余人〉。1959年12月5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59d。〈印尼国会一致通过支持禁乡村外侨经营零售商〉。1959年12月31日电讯三03版。
- 《南洋商报》1965。〈自从政变以来 共党国家轮船 停止川航印尼〉。1965年11月6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6a。〈印尼陆军摊牌获全胜 苏哈多着手接管政权 以苏卡诺总统名

- 义发施号令 宣布解散内阁 逮捕亲共部长 封禁共产党及属下一切组织)。1966年3月13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6b。〈苏哈多代表苏卡诺下令印全国政府机关一概须肃清共党〉。1966年4月2日国际新闻02版。
- 《南洋商报》1966c。〈印尼外长马力克拒绝安排船运遣送华侨返国〉。1966年4月14日马来西亚新闻05版。
- 《南洋商报》1966d。〈印尼不准许中国派耶城总领事往棉兰遣侨〉。1966年9月22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a。〈印尼政府昨日宣布中国代办暨总领事本周内须离开印尼 北京采取报复行动 印代办与第一参事应在同一限期离境〉。1967年4月25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b。〈中国指责印尼阻挠撤侨工作〉。1967年5月11日要闻二24版。
- 《南洋商报》1967c。〈印尼派一营及一连军队往西婆边区围剿共产党〉。1967年8月20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d。〈印尼训令驻华使馆全体职员收拾返国〉。1967年9月16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e。〈印尼内阁昨紧急会议后宣布中止与华邦交〉。1967年10月10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f。〈中国答复印尼上周通牒 关闭驻印使馆 撤回华外交官〉。1967年10月29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g。〈中国专机送印尼外交馆返耶 撤离大使馆人员〉。1967年11月1日要闻二22版。
- 《南洋商报》1967h。〈西婆华人流落山口洋镇 许多卧病无法医疗 企图自杀了却残生〉。1967年11月16日要闻二20版。
- 《南洋商报》1967i。〈西婆华籍难民生活悲惨 论斤卖儿女 每公斤只值星马币三元或仅换取少许粮食金钱〉。1967年11月29日报头01版。
- 《南洋商报》1967j。〈西婆十三村长联合声明 反对华人难民还乡〉。1967年12月30日要闻二20版。
- 《南洋商报》1968a。〈印尼计划移殖西婆五万华人〉。1968年2月4日国际新闻02版。
- 《南洋商报》1968b。〈西婆华人难民纷纷死亡沦为乞丐娼妓〉。1968年2月16日国际新闻02版。
- 《南洋商报》1968c。〈印尼西加里曼丹难民营二千多名华人难民死亡 政府拨出二亿五千万盾推行重新安顿难民计划〉。1968年6月29日报头01版。
- 丘守愚1934。《二十世纪之南洋》。上海：商务印书馆。
- 丘守愚1947。《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上海：正中书局。
- 丘正欧1995。《苏加诺时代印尼排华史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三厄斯1950。〈北婆杜森族研究〉。《南洋商报》1950年5月24日南洋一07版。
- 田汝康1987。〈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末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公司组织〉。载《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编著1985。《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
- 文化出版社编辑部1947。《战后南洋华侨概况——西婆罗洲之部》。新加坡：星洲文化出版社。
- 《星洲日报》1960。〈印尼属婆罗洲华侨 登记后轮返国者 已有一万二百名〉。1960年4月9日电讯二02版。
- 《星洲日报》1966a。〈中国宣称将派轮船到印尼载华侨返国〉。1966年5月19日报头01版。
- 《星洲日报》1966b。〈中国通知印尼将派船接侨〉。1966年9月8日电讯二03版。
- 《星洲日报》1967a。〈中国指印施限制无法派船偕华侨〉。1967年3月31日电讯二02版。
- 《星洲日报》1967b。〈中国严厉谴责印尼 促即释放徐仁总领事〉。1967年4月25日报头01版。
- 《星洲日报》1967c。〈中印互撤人员 两国外交中断 中国飞机载印尼官员抵椰加达 随即又运返廿名中国使馆人员〉。1967年11月1日报头01版。
- 郑学稼1976。《印度尼西亚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郑资约1974。《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国立编译馆。
- 周丹尼（Daniel Chew）著，黄顺柳译1990。《砂朥越乡镇华人先驱》。古晋：译者自版。
- CATOR, W. J. 1936.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 Margaret 2013. The Spirit-mediums of Singkawang: Performing ‘Peoplehood’ of West Kalimantan. In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edited by Sai Siew-Min and Hoon Chang-Yau. New York: Routledge.
- COPPEL, Charles A.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TY, E. and POHLMAN, W. J. 1839. Tour in Borneo, from Sambas through Montrado to Pontianak, and the Adjacent Settlements of Chinese and Dayaks, during the Autumn of 18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8(6): 283-310.
- EARL, George Windsor 1837.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33-34*. London: W. M. H. Allen and Co..
- GODLEY, Michael R. 1989. The Sojourner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62(3): 330-352.
- HEIDHUES, Mary Somers 2003.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Ithaca, N. 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 HUI, Yew-Foong 2011. *Strangers at Home: History and Subjectivity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Leiden: Brill.
- JACKSON, James C. 1970. *Chinese in the West Borneo Goldfields: A Study in Cultural Geography*.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 LOW, Hugh 1848. *Sarawak: Its Inhabitants and Production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 PELUSO, Nancy Lee 2006. Passing the Red Bowl: Creating Community Identity through Violence in West Kalimantan, 1967-1997. In *Violence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edited by Charles A. Coppel. London: Routledge.
- PELUSO, Nancy Lee 2008. A Political Ecology of Violence and Territory in West Kalimantan.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9(1): 48-67.
- TANASALDY, Taufiq 2012.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Dayak Politics of West Kalimantan*. Leiden: KITLV Press.
-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HANTILE ADVERTISER 1851. Sarawak.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4 January 1851, p. 3.
-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HANTILE ADVERTISER 1914. The Borneo Rising.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 Aug 1914, p. 7.
- WANG, Tai Peng 1977.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Borneo*. M. A.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YUAN, Bingling 2000.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CNWS, Universiteit Leiden.

口述访谈

- 范钹钹, 印尼西加山口洋南华中学毕业校友, 与作者谈话, 台湾新竹, 2014年7月4日。
- 杨建昌, 雅加达客属联谊会秘书长, 与作者谈话, 印尼雅加达, 2011年7月31日。
- 叶锦进, 印尼西加山口洋新喃村新光明印华学校教师, 印尼西加山口洋, 2011年8月4日。
- 钟翠娜, 南中校友会山口洋分会初中华文补习班毕业生, 与作者谈话, 马来西亚雪兰莪加影, 2014年8月22日。
- 钟学胜, 印尼赤道基金会文教部主任, 与作者谈话, 印尼西加山口洋, 2011年8月3日。
- 周沅瑶, 旅椰山口洋地区乡亲会会长, 与作者谈话, 印尼雅加达, 2011年7月31日。

